



国 | 际 | 问 | 题 | 学 | 术 | 文 |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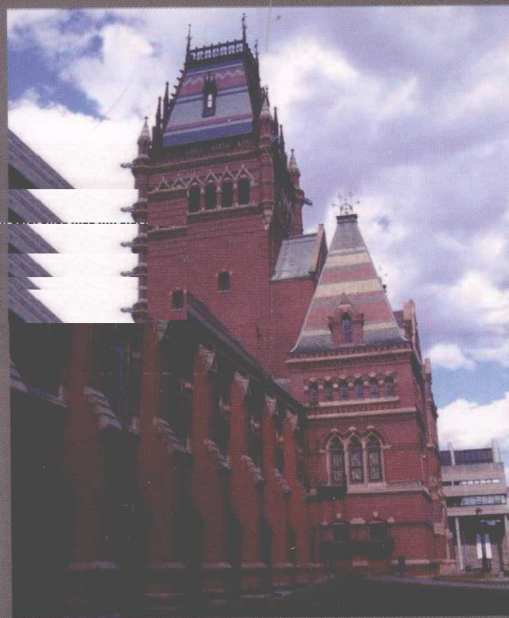
JIAOYU YU ZHENGZHI, JINGJI DE SANXIANG HUDONG

1949-1978 NIAN DE ZHONG GUO JIAOYU JIAOLIU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

黄仁国 © 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库

JIAOYU YU ZHENGZHI, JINGJI DE SANXIANG HUDONG

1949—1978 NIAN DE ZHONG MEI JIAOYU JIAOLIU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

黄仁国 ◎ 著



世界学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1949—1978 年的中美教育交流/
黄仁国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8

(国际问题学术文库)

ISBN 978-7-5012-3897-2

I. ①教… II. ①黄…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交流—教育史—
研究—1949—1978 IV. ①G523.3 ②G5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3711 号

书 名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
1949—1978 年的中美教育交流
Jiaoyu yu Zhengzhi 、Jingji de Sanxiang Hudong:
1949—1978 Nian de Zhong Mei Jiaoyu Jiaoliu

作 者 黄仁国

责任编辑 柏 英

特约编辑 林 昶

责任出版 刘 喆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投稿信箱 guojiwenti@yahoo. com. cn

照排印刷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 毫米 1/32 11 3/4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327 千

版次印次 2010 年 8 月第一版 201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897-2

定 价 30.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在浩如烟海的学术专著中，国际问题研究类是涉及面广的一类。它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文化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支众多。

世界知识出版社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国际问题读物的出版。经过 70 多年发展历程，不仅以出版世界知识普及读物见长，而且成长为出版国际问题学术专著的一支生力军。尤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本社不仅出版了许多老一辈知名专家学者的代表作，也出版了大批中青年新秀的成名作、处女作。内容涉及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外关系研究、俄罗斯研究、日本研究、美国研究、拉美研究等领域。

为了进一步繁荣这类图书的出版，本社决定编辑出版“国际问题学术文库”。本丛书旨在推动国际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追踪国际形势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国别与地区问题，探索变化规律，提出对策建议，等等。相信这对我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外事业务开展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还旨在进一步团结国际问题研究的作者队伍，为莘莘学子学位论文的出版搭建平台，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研究来推动这一领域的教学工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等等。欢迎广大作者不吝赐稿。我们将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倾注全部的热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问题研究编辑室

序 言

教育是传承和发展科技文化、确保人类社会进化的最重要环节。从国际政治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准，构成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通过教育交流提高教育水平，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中，教育交流具有特殊地位与作用，被广泛纳入公共外交范畴。进入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速发展，国际政治“软实力”和公共外交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此背景下，黄仁国先生《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一书问世，可望为相关学术研究注入新内容，提供新助力。

教育交流的态势，反映着国家间教育水平、发展程度乃至实力对比的状况，中国对外教育交流进程也大致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相适应。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东亚乃至全球都居前列，文化相对发达，教育制度相对完备，曾长期是日韩等周边国家向往与学习的楷模。近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腐败无能，传统科举应试教育落后于近代科技发展，导致中国长期贫弱落后，遭遇欧美列强欺凌，促使清朝朝野痛定思痛，下决心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学习借鉴其先进科学技术。从为师到求学，中外教育交流的基本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教育交流进入新阶段，尤其是随着30年来改革开放的全面而深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全面开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中国增派留学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提出4年向中国派遣10万留学生的宏伟计划，部分地反映出当代中国对外教育交流态势渐趋平衡。

作为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教育交流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

文化关系相比，又具有其特殊性。其突出特点是，虽不像国际政治军事关系那么敏感，却既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状况的影响与制约，也反过来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史上，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颇具典型性。其间，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美苏冷战。受其影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政策实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对外教育交流也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诸国，从教育体制到教学内容无不参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版本。相应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推行强硬政策，对华教育交流陷入中断。也恰恰是教育交流不像政治经济关系那么敏感，因而能通过相关人员接触，居中传递信息，改善彼此认知，从而为政治、经济乃至总体国家关系改善创造条件和氛围。随着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和美苏战略态势出现对美不利的变化，中国和美国在战略上都有接触与合作的需要和意愿，双边教育交流便先于政治经济关系正常化恢复发展起来。

教育交流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进而改善相互认知，促进国际关系发展，其程度与教育交流的态势或模式相关联。前不久，在“世界文明对话公众论坛”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提出，在中美与中俄的关系中，存在着相互了解不对称的现象。中国民众对美国 and 俄罗斯了解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其实，这就是不对称教育交流的后果。冷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教育交流主要面向苏联。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苏联几乎就是世界。但对多数苏联人来说，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向全方位外交，重点开拓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吸引外资与高新技术，对外教育交流也重点转向这些国家。这个时期，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美国也几乎就是世界，而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中国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如何评估这种不对称或不平衡教育交流的后果与效益，这是需要探讨的。一方面，科技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处于低端，能够较多

地借鉴高端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提高本国的科技教育水平，缩短科技教育差距，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久而久之，随着自身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可以逐步改变不对称或不平衡交流的态势。从清末到民国，有詹天佑、李四光和王宠惠等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地质勘探、矿山开采乃至处理涉外事务等领域的领军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又有以华罗庚、钱学森等为代表的著名归国科学家群体在振兴和发展新中国科技进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巨大作用。同时，通过聚焦式教育交流，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和理解交流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做到知己知彼，有助于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有的放矢。冷静地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这恐怕与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和理解相对充分不开。另一方面，科技经济与教育相对强势的国家，在教育交流中难免持居高临下的强势心理，好为人师，甚至借教育交流强行传播自身文化和价值观，把教育交流作为谋求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工具。居高临下的心态容易使这些国家不太重视了解弱势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心理，从而导致对外政策缺少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与苏联对华判断与政策曾经出现的大小失误，恐怕原因也就在这里。

就中国对外教育交流的历史而言，本书涉及的时期曾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属于学术空白。黄仁国先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依据较权威的中文报刊，系统阅读和搜集资料，并尽可能借鉴英文材料，认真梳理中美交流的脉络，特别注重政治、经济与教育间的动态相互关系，深入思考，提出不少颇具启发性的看法，为推进中美乃至中国整体对外交流的学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也为新时期推进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与黄仁国先生相知多年。对他真诚朴实、虚心好学、勤于思考、善于思辨的学术品质与学术精神有深刻印象。正如他在“后记”中提到的那样，最初相识时，他曾对国际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先后发表过几篇论文。师从周秋光先生攻读历史文化专业博士



学位后，我曾不经意地建议他将中美教育交流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几年下来，经导师悉心指点和个人不懈努力，他居然选取中美学术界最少涉猎的这段历史，表现出知难而进的学术胆略与勇气，而且学有所成，博士论文获得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一致好评，进一步展现出他的学术能力和潜力。值本书付梓，遵嘱为序，感谢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贡献，期待他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宽广。

王在邦

2010年仲夏于北京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1949—1968)	5
第一节 近代中美教育交流概述	5
第二节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9
第三节 恢复教育交流的准备	27
第四节 有限的教育交流	41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 (1969—1972)	71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71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117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 (1973—1976)	145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145
第二节 CSCPRC 的交流活动	163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180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188
第五节 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	206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 交流思想	229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 (1977—1978)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	237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237
第三节	中美往来的新突破	244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250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265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280

第五章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总结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301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301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309

结 论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 记

导 论

在不少学者看来,教育交流就是文化交流。如梁碧莹新著《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①主要研究的就是近代中美教育交流。于富增等从“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开始谈教育交流,将古代中国“出国学习别的国家文化”视为早期的教育交流。^②卫道治认为,教育“是文化中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和继承人类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各个方面的交流混杂交融在一起的”。因而,教育交流不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中外交流”,而涉及“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③田正平、肖明认为:“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④

也有学者仅仅从教育的角度理解教育交流。顾明远、薛理银认为:“所谓国际教育交流就是世界各国的教育的相互作用。”^⑤朱宗顺认为,教育交流就是“不同主体的教育所有物的跨境互通,它既包括不同主体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经验等内容的交流,也包括教育服务以及与教育有关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互换”。^⑥彭末名认为:“国际教育

① 梁碧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于富增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③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④ 田正平、肖明:《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第139页。

⑤ 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际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⑥ 朱宗顺:《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交流与管理是教育实体在境内、境外采取适当的途径和形式,吸收具有不同国籍或文化背景的教育者参加的教育或科学研究活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管理活动内容的总称。”^①

显然,教育交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交流与文化交流相联系,而狭义的教育交流则特指教育领域内的各种交流。

除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外,教育交流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要对不同时代的教育交流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至少要明确教育交流的主体、客体、形式和动力等问题。

教育交流的主体是教育交流活动的行为体。教育及其管理机构、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是基本的行为体。在当代,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种力量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教育交流活动,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都可以成为教育交流的行为体。

教育交流的客体是指交流的具体内容,包括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

教育交流的形式很多,主要有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其中,人员往来的常见形式有互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代表团互访、跨境教育兼职(如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

教育交流的动力来自利益的驱动。利益可以有多种分类。按层次分,可分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按内容分,可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政治利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对于国家而言,教育交流是一种手段,是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或人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期目标看,它可以增进了解,促进友谊;从长远目标看,它可以影响别国的人,进而改变他们,从而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一些国家曾通过长期的教育交流进行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这也是政治利益的实现形式。集体或个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交流增加影响力,从而提升社会地位,获取政治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交流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这在教育市场

① 彭未名主编:《国际教育交流与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化、产业化后尤其突出。对于企业和贸易部门而言，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可以通过发展以教育为基础的技术交流促进贸易发展和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处于技术劣势的一方则可以通过商业途径获取知识和技术，从而实现企业的技术升级。文化利益是教育交流的最直接的利益。通过有形的教育资源的交流和无形的思想观念的碰撞与融合优化教育资源和提升教育水平，是教育交流的最直接的目标。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

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与中美两国的国情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的近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这30年的中美关系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经历了观望、对抗、试探、破冰、磨合与合作等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的阶段，教育交流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捍卫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是两个最基本的任务。这两个基本任务在不同时期轻重缓急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的政权、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压倒一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度成为党和政府的共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头”，政治权威、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都大为提升。这种地位使其很快走上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意识形态因素甚至长期压倒现实的国家利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中美两国长期对抗，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实力地位衰落的影响，美国政府才开始比较现实地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问题。

由于中美之间长期隔绝、对立，双方在心理层面的厌恨、误解

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双方长期累积的一些现实问题也很难在短期内“一揽子”解决。这就决定了双方都需要时间和智慧去填补鸿沟，需要通过非敏感性的渠道来架设友谊和理解的桥梁。因此，加强民间交流就成了中美建交之前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步骤，教育交流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是在两国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其首要目标就在于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友谊，为中美建交做准备。同时，发展政治关系需要经济贸易关系来支撑，这又使教育交流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与中美建交之后的教育交流相比，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有其特殊属性，它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两个层次深刻地揭示了1949—1978年中美关系的实质，只有将其置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三向互动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1979年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从其涉及的层次和领域来看，中美教育交流已经涵盖了复杂而重要的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这些发展也与两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是推动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支柱，而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倡议”和“美国竞争力倡议”则把国际教育交流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显然，只有将中美教育交流置于和政治、经济的互动中深入考察，才能深刻洞察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变化。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如资料、学术理解、政治因素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学术界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系统研究都不多。如果能够从教育与政治、经济三向互动的角度对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进行系统梳理，就有可能打通近代与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研究，对整体的中美教育交流有一个完整和清晰的把握。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1949—1968)

1949—1968 年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观望后便进入激烈对抗的时期。冷战爆发,意识形态因素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军进驻台湾地区,使中美长期激烈对抗。受政治因素影响,中美教育交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快中断。之后,虽然中美两国都作了恢复教育交流的试探和准备,但这 20 年中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非常有限。

第一节

近代中美教育交流概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不同国家开展教育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就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案例。

美国立国的时间不长,但与中国进行教育交流的时间却较早。早在 1830 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贝满学校(Bridaman School),收留几个穷苦的中国孩子,教他们英语,也讲授基督教教义,这是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学校。^①1839 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博士在广州开办马礼逊学堂,此后该校相继迁往澳门和香港,容闳、黄宽等都在 1841 年进入该

① 李浩:《美国来华传教士第一人——裨治文》,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第 125 页。



校学习。^① 1846年冬，香港马礼逊学堂美培校长布朗因病回国调养，将该校学生容闳、黄胜、黄宽三人携往美国留学，送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容闳等成为近代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1848年秋，黄胜因病回国。次年，黄宽转赴英国学医；1850年容闳则得到美国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资助，考取耶鲁大学，并在1854年以优异成绩从耶鲁毕业，成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②。

容闳1855年9月回国，从此发起“西学东渐”事业，筹备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事。经洋务派重要首领李鸿章支持，1872年，清政府首批官派出国留学生30名幼童由容闳和清政府派遣的官员护送赴美学习。到1875年，先后向美国派出4批120名幼童。清政府的首批官派出国留学工作尽管因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夭折，但这批幼童后来所从事的工作，除外交工作外，多数工作与当时世界上的铁路、矿业、电信等先进技术有关，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个在美国读完大学本科的。^③

20世纪以前，尽管中美教育交流在中外教育交流中颇具开创性，但总体规模并不大。1906年，清政府派大臣赴欧美考察，着重考察了美国教育。美国各大学校长提出每年向中国免费提供若干留学名额，开留美奖学金之先例。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经中美协商，议定庚款用途为：“（1）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2）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的预备学校；（3）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于华盛顿。并拟定了派遣游美学生的具体办法。”^④ 这又开“庚款留学生”之先例。此后，中美教育交流有了迅速的发展。从1908年开始，接受美国津贴所办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文

① 辛彦怀：《对中国近代教会学校的认识与评价》，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79页。

②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③ 于富增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④ 同②，第163—164页。



化出版机构以及宗教团体遍布中国各地，中美教育交流出现多层次多领域共同发展的态势。

20 世纪初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点。其官费留学生以国家部门派出为主，北洋政府也派遣了大学教授赴美进修学习。由于中美两国政府都重视双边教育交流，赴美留学生（包括自费留学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并超过留欧学生的总数。辛亥革命后，在美国的各国留学生中，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已占首位，而且之后长期独占鳌头。

中美教育交流的迅速发展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其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教育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感情，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看，美国想要控制欧洲确实为时尚早，但要在远东逐渐扩大其战略利益却不是没有可能的。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希望通过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夷制夷”，更希望通过开展中美教育交流促进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以实现强国的战略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美教育交流继续发展。美国的一些民间组织机构主动为中国提供数额可观的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战时中国留学生分布最多的国家。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国。这一时期，有不少美国友人奔赴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包括通过支教的形式帮助中国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格局，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有机会与美国友人沟通交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更是暴增。由于蒋介石政府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加上美国在二战后实力剧增等原因，美国在华文教机构如教会学校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几乎是一家独大。此外，中美两国已开始有了双边教育交流计划，如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主管的富布赖特项目 1947 年最先在中国落户。